

中国“新一轮移民潮”的原因及对策探究

闫海燕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 湖北 武汉 430072)

【内容摘要】自2010年6月起,“新一轮移民潮”逐渐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与中国前两次移民潮不同的是,中国的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已成为新一轮移民的主力军。然而,所谓的新一轮移民潮的说法是否成立?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选择移民的理由是什么?反映了怎样的社会问题?中国该如何应对“新一轮移民潮”?作者在归纳社会各界观点的基础上对上述关键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总结,提出了应对“新一轮移民潮”的重要对策,这对于中国社会体制改革,促进社会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知识精英 新富阶层 移民潮 原因 对策

中图分类号 D63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1)02-0086-04

中国大规模迁移海外始自19世纪中叶。据不完全统计,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的100年里,中国人出国人数将近1000万,足迹遍及五大洲数十个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近20年来,随着世界经济国际化的发展,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移民政策的调整,欢迎国外移民流入,致使发展中国家人口大量移居发达国家;跟随着世界性移民新潮流,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华裔人口,也向发达国家移动。

东南亚各国是中华民族群最集中的地区。据台湾报纸报道,截至1999年底,中国大陆及台湾、香港、澳门地区以外的海外华族人口总数已达3455万余人,其分布以亚洲地区为最多,共约2678.8万多人,占77.63%。其次为美洲地区,约有601.3万多人,占17.43%。欧洲有96.8万多人,大洋洲有65.5万多人,非洲有13.2万多人。

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经历了混杂过渡客的底层劳工和俗称“洋插队”的两次移民潮。跨入21世纪后,中国移民人数逐渐增多,已经形成了新一轮的移民潮。与前两次移民潮不同的是新世纪移民潮的主力由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组成。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移民出口国,目前约有4500万华人散居世界各地。

一、“新一轮移民潮”的涌现

有关“新一轮移民潮”的说法,早在2010年的6月就已经被炒得火热。“新一轮移民潮”之所以炒得火热,不仅仅是移民海外的人口数量上的增长,其关键在于此次移民的人员中,不再是被迫下南洋时期的“卖猪仔”,也不是带有盲目性的“偷渡客”和“洋插队”,而是具有综合理性的带有高学历、高技术、高成本等特点的社会精英阶层。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6月16

日,国务院侨办公布,中国海外侨胞的数量已超过4500万,绝对数量稳居世界第一。此次移民的人员中,主要是带着大量财富和高新技术走出国门的,具有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的性质,使得“知识精英”和“社会财富”的集体流失,所以社会上对此次移民潮给予了高度关注。

在此次移民中,一方面是投资移民,使得“社会财富”大量流失。据美国国务院最新公布资料显示,2008年10月-2009年9月的联邦财政年度获批的EB5类签证移民总数,已从2008财年的1443人升至4218人,其中七成来自中国。同时加拿大的投资移民起步价约人民币235万元,在去年的2055名投资移民中,大陆的名额就占1000人,从中国流向加拿大的财富至少达23.5亿人民币。另一方面是技术移民,使得“知识精英”集体出逃。中国近10年申请各国技术移民的数量与投资移民相比,比例大约为20:1。在加拿大,每天有近60名教育背景良好、工作体面、收入颇丰的中产精英,向加拿大移民局递交移民申请。据统计,去年中国移民加拿大人数2万5千人,移民美国6万5千人,而回国的人员却寥寥无几。自1978年以来,有106万中国学生留学海外,仅27.5万人回国。留在海外的78.5万新移民相当于30所北大、30所清华的所有在校本科生。按照国际上惯用的人才流失指标——人才回流率(即归国人员占外迁人口的比例)来看,我国人才回流率是相当低的。

各种数据表明,自上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两拨移民潮以来,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三拨移民高潮在进入新世纪的十年中已成愈发汹涌之势,新世纪移民潮的主力由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组成。由于富豪群体的移民,实质是中国高端人才的流失和财富向海外的转移。所以高端群体、庞大数量和趋势化的“新移民潮”发展构成了国家和社会不容忽视和必须面对的问题,关系到中国能否留住人才,

* 作者简介:闫海燕(1970-),女,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博士,河南省南阳市商业银行长江路支行行长。

这已成为目前国内上下共同关注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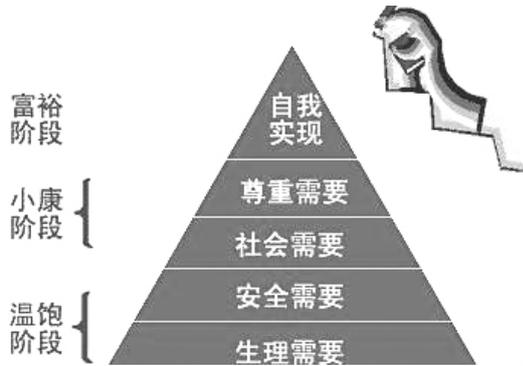
二、“新一轮移民潮”涌现的原因

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是当今世界最有吸引力的掘金地之一，全球投资家以及各类淘金者争先恐后入华，意图在中国百年罕见的发展热潮中分一杯羹。而与此同时，中国本土的富人却纷纷背土离乡、举家外迁，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各界精英富商通过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的渠道，获取他国永久居民权(以下简称 PR)和国籍，甚至年薪 20 万人民币以上的人士都想移民海外，这些社会精英移居海外的现象背后又反映了怎样的社会问题？

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认为，人类价值体系存在两类不同的需要，一类是沿生物谱系上升方向逐渐变弱的本能或冲动，称为低级需要和生理需要。一类是随生物进化而逐渐显现的潜能或需要，称为高级需要。他把这两类需求划分为三个阶段(温饱阶段、小康阶段、富裕阶段)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人都潜藏着这五种不同层次的需要，但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来的各种需要的迫切程度是不同的。人的最迫切的需要才是激励人行动的主要原因和动力。人的需要是从外部得来的满足逐渐向内在得到的满足转化。低层次的需要基本得到满足以后，它的激励作用就会降低，其优势地位将不再保持下去，高层次的需要会取代它成为推动行为的主要原因。有的需要一经满足，便不能成为激发人们行为的起因，于是被其他需要取而代之。当人的某一级的需要得到最低限度满足后，才会追求高一级的需要，如此逐级上升，成为推动继续努力的内在动力。

马斯洛理论把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会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如图所示)。

那么我们就用马斯洛理论来分析引起新一轮移民潮的



原因。

1. 生理上的需要

作为新一轮移民潮的新富阶层和社会精英，温饱问题已经解决，那么温饱阶段的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理应解决。依据马斯洛理论他们应该向更高层次追求发展。但现实是什么情况呢？在吃、喝、住、衣、行等各个方面都无法满足人的需要。生理上的需要是人类维持自身生存的最基本要求，包括饥、渴、衣、住、行的方面的要求。如果这些需要得不到满足，人类的生存就成了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生理需要

是推动人们行动的最强大的动力。生活的不安全，造成了生存的不安全，生存的不安全使得生理上的需要得不到满足。一个是生活环境实在是挺糟糕的。中华美食世界闻名，只是现在谁还敢放心地吃什么？三聚氰胺、地沟油、苏丹红，布满农药及生长素催大的反季节蔬菜水果，用漂白的米粉，用硫酸整白的馒头，以及食品中含有无数你根本弄不清是什么的添加剂，似乎要是拿个化学方面的学位还要组建一家实验室才能放心。喝的是污染的水，呼吸的是充满有毒的空气，走在路上是无法释怀的堵车，高涨的房价和飞涨的物价令你成为“房奴和物奴”。如果不在大城市生活的话，估计赚钱方面不会达到预期，生活在大城市，辛苦赚来的钱，眨眼之间就已经跟不上飞涨的房价或者油价，然后在这个信息已经很畅通的时代里我们发现，人家那里买个别墅的钱，我们这里只能买个好地段的厕所。如此这般之后，您还会发现自己的房子算是只有 70 年的使用权，按照现在拆迁的强度，以后到了时间要拆迁你的后人，恐怕就算是可持续性发展的续集了。股市就更是不用多说，那就是圈钱的地方。马斯洛认为，只有吃、喝、住、衣、行等这些最基本的需要满足到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程度后，其他的需要才能成为新的激励因素。如果一个国家里，最基本的需要得不到满足，不能有安全的生活环境、不能保证人身与财产的安全，即使这里有再多的机会，这些机会也就是供有能力的人取得离开这里的资格而已。在这样的场景之下，流失的不可不止是人才，还有很多金钱也随之而去了。

2. 安全上的需要

安全上的需要是人类要求保障自身安全、摆脱事业和丧失财产威胁、避免职业病的侵袭、接触严酷的监督等方面的需要。高昂的医疗费可以使国人一病返贫，庞大的官僚机构让国民在税收上苦不堪言，医院、学校、银行等为民服务的机构充满衙门作风，像官老爷一般威风凛凛，严峻的就业形势，工作的不稳定让人整日忧心忡忡，诚信的丧失使人与人之间缺乏基本的信任，夫妻之间没有忠诚可言，财产的不安全使得一辈子的拼搏瞬间化为乌有，物价不稳定，通货膨胀，银行利率浮动，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征地拆迁等，都有可能使财产贬值，扭曲的杀童案、频繁的自杀事件、经常的矿难事故、严重的贫富分化，使得社会精英整天提心吊胆。马斯洛认为，整个有机体是一个追求安全的机制，人的感受器官、效应器官、智能和其他能量主要是寻求安全的工具，甚至可以把科学和人生观都看成是满足安全需要的一部分。在一个没有保障的社会制度下，没有安全感，那么稳定就是保障，在一个生老病死基本靠自己的国家，只有安稳的过着日子，才能将风险降到最低。因此肯定抹杀了很多创造力、创新力。没有安全感，缺乏创造力、创新力的地方，又怎么能够留住社会精英呢？

3. 感情上的需要

感情上的需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友爱的需要，即人人都需要伙伴之间、同事之间的关系融洽或保持友谊和忠诚。现实却是人与人之间金钱至上，一切向钱看，为了钱可以出卖朋友、兄弟甚至自己的人格，为了钱人与人之间更无诚信可言。人人都希望得到爱情，希望爱别人，也渴望

接受别人的爱。然而道德的集体失落、集体腐败、集体嫖娼、集体造假。人情冷漠的例证也比比皆是,120挑活干,医院有钱才救人,街边的流浪者有多少人关注,那些身体残缺的乞丐,有多少人关心他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普通人对边缘人的冷漠,既得利益者对普通大众的冷漠,有人要跳楼的时候看热闹的甚至有喊快点跳,使得人们对社会的失望降至冰点。二是归属的需要,即人都有一种属于一个群体的感情,希望成为群体中的一员,并相互关心和照顾。感情上的需要比生理上的需要来的细致,它和一个人的生理特性、经历、教育、宗教信仰都有关系。我们为了生存,宁可奴颜媚骨,宁可让别人颐指气使,社会信仰缺乏,人与人之间没有共同的归属感。

4. 尊重的需要

人人都希望自己有稳定的社会地位,要求个人的能力和成就得到社会的承认。尊重的需要又可分为内部尊重和外部尊重。内部尊重是指一个人希望在各种不同情境中有实力、能胜任、充满信心、能独立自主。总之,内部尊重就是人的自尊。外部尊重是指一个人希望有地位、有威信,受到别人的尊重、信赖和高度评价。“社会精英”和“新富阶层”都是有一定经济条件、经济保障的,内部尊重已经实现,但在一个等级森严,尊卑思想极其强大的社会里,大家受保护程度低,奴性成了生存哲学,这样的人依旧只是温饱的动物,外部尊重却让人不敢恭维。在一个国度里,如果把入只当做温饱的动物,不能够真正地让他们挺直腰杆,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事,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处于某种依附关系中,那么,人就活得没有尊严。在充满潜规则的社会里,再有能力,再能干,他要去做件事情,也得低下头来,讨好某个不让人尊重的人,对他打点,对他点头哈腰,降低自己的尊严来服侍一个自己不尊重的人,使人不自在、不舒服。最后事情办得在那么样,能否成功,还没有把握,不得不处于疑神疑鬼的状态中,仿佛是在头顶上悬挂的一把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落下来。这样的人就处于生活在损害尊严,被支配,被屈从,被依附的环境里,那么尊重需要得不到满足,就不能使人对自己充满信心,对社会满腔热情,不能体验到自己活着的用处和价值。这样社会精英和新富阶层就会选择更适合于他们的生活环境,结果就是“用脚投票”。

5. 自我实现的需要

自我实现的需要是最高层次的需要,它是指实现个人理想、抱负,发挥个人的能力到最大程度,完成与自己的能力相称的一切事情的需要。也就是说,人必须干称职的工作,这样才会使他们感到最大的快乐。为子女寻求优质的教育环境,寻求生活安全感,免于被支配的自由,说到底,都是为了实现自我的需要。社会没有为这些精英人士提供好的发展平台,不能够让他们看到自己才能施展的空间和上升的希望,实行论资排辈,不能激发他们的热情,没有提供他们发展的软件和硬件设施。市场环境脆弱,上升渠道堵塞,权力阶层化,财富垄断化,形成新时代的权力与财富结合的“天花板”,政府部门不是充当社会的“守夜人”,没有良好的环境保护他们,支持他们,使他们觉得为实现一心报效祖国、为国尽忠的希望是非常困难的。虽然每个人满足自我

实现需要所采取的途径是因人而异的,但良好的环境是实现自我价值,实现自我需要的关键因素。只有自我实现的需要是在努力实现自己的潜力,使自己越来越成为自己所期望的人物时,才会觉得这里的生存环境、生活环境、实现自我的环境是最好的,才会真正留下来。

三、应对“新一轮移民潮”的对策

中国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陆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国际移民,其中不乏作为社会中坚的精英阶层,通过留学、技术移民或投资移民等方式移居海外,大多前往欧美澳加等西方发达国家。

人们不禁产生疑问:这些高素质人才往往都是耗费了本地社会十余年,甚至数十年的资源才培育出的精英,恰是当下稀缺的人力资本,如此轻易就流失海外,中国又应该如何面对“新一轮移民潮”?

1. 弥补制度缺失,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防止精英以及财富继续流失,首先应该从体制上弥补制度缺失,一方面加快体制改革,从制度上营造公平化、透明化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消除政治上的论资排辈,消除经济上以财富为社会的标杆的做法,完善市场经济,逐步放开对民资的限制,消除社会上各种各样的潜规则,让潜规则变成显性规则,让人们有尊严的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加强法治建设,建立有吸引力的制度环境、社会氛围,更适合人的发展,是人才确实能够干出成绩来。让资源获取更加公平、公正,加大物权保护,依法保护私有财产。

另外,随着贫富差距拉大成为严峻的社会现实,管治者必须更加谋求贫富阶层之间的相互理解和良性共存,这不仅有利于纾解富人的不安全感 and 化解贫困人士的仇富心理,也有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对于富人团体,应该在法律的框架内让他们更自律、更安全、更自由。减少行政管制,打破行政垄断,让富人资本能够自由进入。社会对待富人及其财富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让其自由进入各行各业,实现财富社会化;允许其符合人类天性的奢侈品消费,鼓励其慈善事业。

2. 完善市场经济,促进社会公平和安全感

目前富人移民海外,我们应该反思。要留钱,先留人,要留人,先留心。我们应该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让资源的获取变得更公平,要继续保留企业家精神。其实很多人很矛盾,知道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发展最好的国家,但是又感到不安全,所以想往产业链的上游发展,所以要投资金融业、能源业,但是这些行业又不是完全开放的行业。所以最重要的是要继续改革,让不公平变公平,让不安全变得更安全。建立实实在在的公平社会环境,营造实实在在的安全感。

3. 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创造自由的学术环境

目前中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结构布局和学科专业设置还不够合理,教育教学观念、人才培养方式、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还不先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成效不明显,在世界上居于前列的学科还不多,缺乏大师级的师资等等。

2010年5月,在国务院审议通过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强调,为确保《纲要》目标如期实现,要进一步强化教育发展的保障措

施。特别是继续增加教育投入,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到2012年达到4%。政府要逐步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创造更加优质的教育环境,不仅是应对“新一轮移民潮”的有效举措,同时从长远来看也是增强国家综合实力的有力措施。

社会精英之所以选择离开,不肯为这个国家和地区服务,是出于无奈才离开的,因为在国内没有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没有更长久更有吸引力的制度环境、社会氛围。留人先留心,要留住他们,必须改变现有的“官本位”体制,为他们创造宽松自由的环境,改变行政单位、事业单位衙门似的作风,不要造成只有当官才受到尊重。要真正重视人才,使人尽其才,从制度上改变那种人才得不到重视,不是按规矩、老老实实地办事,发挥才华办事就能得到一切的局面。

4.强化故土与海外华侨社的联系,变“人才外流”为人才“流转”

在移民研究的社会学领域,目前主流观点也是强调全球化时代跨国网络所建构出的跨国社会空间,以及由此带来的跨国社会资本积累,社会资本与货币资本之间的转换。人才外流不再只是人们眼中的资源流失,“人才获益”、“人才流转”、“软实力”等概念已逐渐取代了“人才流失”。

今天,我们周围其实早有众多经验可资借鉴。我们可以学习印度,强化故土与海外侨社的联系,因为海外网络就是社会资本,我们也可以学习新加坡和香港,全面打造国际都市以吸引跨国财团,透过企业入驻带来整个海外精英团队。总之,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一个成熟的社会应当思考的,是如何增强自身的吸引力,让现有居民不愿离开,令海外精英趋之若鹜,如果因为担心人才外流而限制人口流动,那就是背离世界大趋势的因噎废食之举了。

5.打破论资排辈的体制,营造年轻人树立信心的环境

这些有思想、有抱负,又很专业的人才不断地流出去,对我们国家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损失。老一代的精英们已经留下来并作出了应有的贡献,那我们怎么留住那些年轻、有发展前景的精英呢?要留住他们,就要提供比较好的平台,让他们看到自己才能施展的空间和上升的希望。然而国内往往是论资排辈的体制,要打破这种格局,让真正有才能的人上位。虽然,我们在这方面已经想了些办法,但还需要能真正提供保障的机制和体制,需要有宽松的环境让大家畅所欲言,把热情激发出来,软硬件的条件都要具备,这样有助于加强国民认同和国家凝聚力。

怎样凝聚人心的问题,是我们国家需要认真探讨的,因为这种离开已不是个别现象了。上世纪50年代,很多人是怀着希望国家中兴的理想回来的,现在从个人来讲,可能是丧失了信心、抱负和担当。但还是要从我们国家自身看,我们怎么营造让他们产生信心的环境。不是发一些文件,说几句要培养他们、重视他们的话就可以了。精英是我们国家未来的栋梁,是未来发展的希望,一定要有良好的环境来保护他们、支持他们,让他们看到希望,才能够让他们一往直前地承担自己的责任。只有让他们感到自身的责任感,他们才会为自己的责任感负责!

参考文献:

[1]丘立本.国际移民的历史、现状与我国对策研究[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5.

[2]钱波.论国际移民与经济发展[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6(3).

[3]龚威.全球移民潮及其经济影响[J].经济学家,2008(1).

[4]中国社科院.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R].2007.